

1980年代 前期中國科幻小說的轉型

• 詹 玲

摘要：1980年代前期，中國科幻小說經歷了一場與自身傳統、意識形態和精英文學多方博弈的艱難轉型。本文系統全面梳理了這段轉型期的歷史軌迹，發現通過「姓科」、「姓文」之爭，科幻小說重放了「文學性」的探索。首先，對時代思潮的跟從，讓科幻小說喪失了自身個性和想像力，但也獲得了人道主義的精神資源和民族化的美學新思路；其次，缺乏「科學性」的批評和自身格調不高等因素，讓通俗化的努力舉步維艱；最後，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導致文藝創作進入嚴冬之後，科幻小說卻朝向精英化的方向發展，在提升了藝術審美與人文精神的同時，卻面臨着想像力被束縛和狹窄化的困境。

關鍵詞：文學性 科學性 通俗化 中國科幻小說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科幻小說在中國文壇掀起了引人注目的創作浪潮。雖然僅僅數年後，這股創作浪潮便因受到1983年開始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以下簡稱「清污運動」）的打擊而陷入低谷，但科幻小說的新時期轉型已由此鋪展完成。比較這一時期與1980年代中後期的科幻小說，兩者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文學風貌。關於這段轉型的歷史梳理，學界研究不多，僅有少量文章簡單描述「姓科」、「姓文」之爭或「清污運動」的影響，尚乏對相關事件系統、全面的溯源考察及影響探究，更沒有對科幻小說如何通過這些論爭和批判完成自身轉型的研究。

本文試圖通過對這段歷史軌迹進行梳理，思考以下問題：一、新時期初的「姓科」、「姓文」之爭為何發生？其歷史背景是甚麼？這場論爭導致科幻小

說發生了怎樣的轉型？二、當科幻小說重啟「文學性」的探索時，被主流接納的渴望讓「新啟蒙」的時代聲音與「特定意識形態」的歷史訴求在何種程度上左右了科幻小說的發展？三、作為重啟「文學性」的另一條道路，為甚麼科幻小說的通俗化道路走得格外艱難？四、科幻小說為甚麼成為「清污運動」的打擊對象？「清污運動」對科幻小說的後續發展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一 新時期之初的「姓科」、「姓文」之爭

1978年8月，童恩正塵封十餘年的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發表於《人民文學》^①。作為首部被《人民文學》這一與新中國同齡的權威文學刊物所接納的科幻小說，對於新時期科幻創作的意義非凡。它不僅意味着科幻小說結束了游離於主流文學之外的命運，還昭示了科幻小說在新時代的創作方向。

《珊瑚島上的死光》講述了兩代科學家趙謙和「我」為祖國富強積極投身科技發明事業，並為捍衛科學成果與某大國武器陰謀製造者展開的殊死搏鬥。這部小說完成於1962年，相較同時期的科幻小說，表現出了明顯的異質性：成人化的敘事口吻，不以傳授科學知識為目的，側重科學故事情節的編織，突出英雄人物，通過敵我鬥爭凸顯時代主題。由於在新時期之初科幻小說依然延續了「十七年」（1949-1966）以來兒童化、科普化的創作思路，儘管這部小說得到了官方文學的肯定，卻遭到了科普界的批評^②。

為此，童恩正特地寫下〈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一文為自己辯白。在這篇被稱為「為『科學幻想』爭得生存的權利而鬥爭」^③的文章裏，童試圖把科學文藝與科普作品區分開來，認為科學文藝的目的「不是介紹任何具體知識，而與其他文藝作品一樣，是宣揚作者的一種思想，一種哲理，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一種探索真理的精神。概括起來講，是宣傳一種科學的人生觀」^④。童的觀點很快引發了一些爭議。如魯兵在1979年8月14日的《中國青年報》上撰文強調，「科學文藝失去一定的科學內容，這就叫做靈魂出竅，其結果是僅存軀殼，也就不成其為科學文藝。」^⑤

蕭建亨在談到雙方爭論時，認為童恩正在文章中「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混淆了已有一定特定含意的科學文藝與科學幻想小說的概念」^⑥。要釐清這一點，我們必須先簡單梳理一下「科學文藝」和「科學幻想小說」這兩個概念在中國文學中的使用和變遷歷程。

1930年代，「科學文藝」一詞由蘇聯引入中國。在蘇聯文學的「科學文藝」概念裏，科學普及讀物和科學幻想讀物之間有明確的界線。蘇聯文藝理論家胡捷（Хузе Ольга）在〈論蘇聯科學幻想讀物〉一文中梳理了蘇聯科幻作品自1920年代以來的發展道路，指出幻想的作用，在於能夠「使作者能更加鮮明、更加尖銳地提出社會問題」，描寫「社會主義世界完全戰勝資本主義力量時的情況」，科幻作品應該以人為中心，將情節「建立在解決科學計劃的過程中的的人和人的相互關係上，像思想上的鬥爭，對於有保守思想、落後思想和陳舊觀念的人們作鬥爭等等」^⑦。

雖然「科學文藝」一詞引入中國後，也用以指稱包括科學普及讀物和科學幻想讀物在內的、與科學相關的各類文學體裁，如1930至1940年代北平世界科學社《科學時報》雜誌中的「科學文藝」欄目裏，既刊載科普文章，又刊載科幻小說，但科學幻想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另有其發展傳統。梁啟超首次提出「科學小說」這一命名，並賦予了「科學小說」以科學思想影響中國學術、政治及哲學文化等方面的使命。1902年8月，梁啟超在〈（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一文中將小說分為十種，其中一種為「哲理科學小說」，這樣的歸類源自他對科學小說偏重哲理性的理解^⑧。同年11月，「科學小說」作為專有名詞首次出現在梁啟超主編的《新小說》第1號（用以指代《海底旅行》）^⑨。

然而，對「科學小說」譯者/作者科學知識及科學精神認識兩方面的高要求^⑩，讓梁啟超的理想停留在理論倡導層面，缺乏具體實踐。晚清科幻小說的實際創作情況，如王德威所言，將「知識與真理的話語」、「夢想與傳奇的話語」統合一體，「以迂迴的筆法，投射了晚清的現實危機」^⑪。敗於列國船堅炮利帶來的民族屈辱，使科學在小說想像中被賦予了無所不能的力量，科幻小說既滿足着國人對未來新政治願景和國族神話的烏托邦想像，如《痴人說夢記》（1904）、《新石頭記》（1905）、《烏托邦遊記》（1906）、《新紀元》（1908）、《電世界》（1909）等；又在神怪敘事傳統、商業化文學時代潮流推動等諸多因素下，被異化為借科學名義證明神道鬼怪之不誣的獵奇故事，如《寶窟》（1906）、《回生術》（1906）、《鯨窟尋親記》（1909）、《秘密室》（1912）、《靈魂鳥》（1914）等，滿足着市民階層的娛樂需求。

上述創作模式，尤其是將「科學」與「鬼神」混雜一處的做法，引起了魯迅等啟蒙知識份子的強烈批判，魯迅毫不客氣地把那些小說家稱之為「好講鬼話的人」，指責他們「把科學東拉西扯，屢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上了妖氣」^⑫。有學者稱梁啟超和魯迅的重要論述和實踐構成了一種兩極化的文化空間^⑬，然筆者認為，魯迅與梁啟超對科幻的認識應是一脈相承的。雖然魯迅沒有像梁啟超那樣強調科幻小說在政治和哲理上的灌輸功能，而是把傳播科學知識作為科幻小說創作的目的，要求科幻小說「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⑭，但在把科幻小說作為「開民智」工具的功利性設定、重視科幻小說的「文學性」，以及把表現社會人情作為科幻小說創作的重要方面等，都與梁是一致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把矛頭直指國內文壇的鬼神迷信思想，給當時風行的通俗科幻小說帶來了很大打擊。1923年的科玄論戰進一步增強了唯科學主義的影響力^⑮。在「科學崇拜」風氣盛行的1930至1940年代，除了老舍《貓城記》（1932）、顧均正《和平的夢》（1939）、許地山《鐵魚底鰓》（1941）等少量以反映現實為主題的科幻小說外，知識化的科學小品成為創作的大趨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儘管左翼文學從蘇聯文學中譯進了「科學文藝」這一概念，但科普化的思路，讓伊林（Илья Я. Маршак）為代表的科普創作及理論成為翻譯的主流。科普創作隨之興盛，產生了董純才《動物漫話》（1935）、賈祖璋《鳥與文學》（1935）和《生命素描》（1936）、高士其《菌兒自傳》（1936）等一批科學小品。相比充滿奇詭想像的科幻小說，充斥着大量圖

表、以說明性文字為主的科學小品在「文學性」方面已了無可言之處，但它們卻代表了左翼文學陣營對「科學文藝」的創作理解。

新中國成立後，在「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下，「科學文藝」的工具性、實用性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強調，並擔負起了向未來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少年兒童——普及科學知識的重任。作為「科學文藝」的一個分支，科幻小說的兒童化、科普化模式也因此定型。一些作家曾對「用一問一答的方式，來給孩子們上『科學』的一課」^⑥的科幻小說創作套路表示不滿，如葉至善覺得這樣的寫法毫無趣味^⑦，蕭建亨也認為「本來可以極為簡單地，可用其他科普形式普及的一點知識，但在科學幻想小說裏，卻成了一塊塊無法消化的知識的腫塊」^⑧。於是，有人開始探尋科幻小說創作的出路。如鄭文光在〈談談科學幻想小說〉中，參照1950年代中期譯介進中國的蘇聯科幻小說創作模式，指出科幻小說應該是「描寫人類在將來如何對自然作鬥爭的文學樣式」^⑨，強調科幻小說大膽的想像力和天才的臆測力。童恩正則創作了《古峽迷霧》（1960）、《珊瑚島上的死光》等充滿探險色彩、富含哲理思考的作品。無論是鄭文光的理論嘗試，還是童恩正的創作嘗試，其目的都在於矯正科幻小說過於偏重的「科」，找回失落的「文」。從筆者掌握的史料來看，他們的努力似乎沒有獲得同行多少響應，《珊瑚島上的死光》甚至在完稿十多年後才能刊發。童恩正在1962和1963年兩年間公開發表的大部分科幻小說如《電子大腦的奇迹》（1962）、《失蹤的機器人》（1962）、《一顆沒有發芽的種子》（1963）等，依然是少兒科普的創作模式。

葉永烈的《石油蛋白》（1976）作為新時期科幻創作的起點，表明了兒童科普創作模式的延續。接下來的兩年間，王亞法、葉永烈、蕭建亨、劉興詩等一批新老科幻小說家，乘着「建設四化」的東風，將兒童科幻創作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如王亞法的《橙黃色的頭盔》（1978），葉永烈的《傷疤的秘密》（1978）、《丟了鼻子以後》（1979），蕭建亨的《胡蘿蔔地裏的秘密》（1978），劉興詩的《海眼》（1979）等。從這個角度來說，童恩正《珊瑚島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應該說是新時期初科幻小說的一個異數。對於童恩正等人而言，該小說的正式發表，讓科幻小說未竟的「文學性」嘗試有了重新開始的契機。而這對於堅持兒童科普創作模式的作家來說，是無法容忍的對傳統的破壞。

於是，一場激烈的「姓科」、「姓文」之爭就此展開。童恩正、葉永烈、尤異等「姓文派」與趙世洲、董鼎山、魯兵等「姓科派」，就科幻小說是否靈魂出竅、是否應該發展科幻文學等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辯。後者力主維護知識化的「科普小品」傳統，而前者則努力將科幻撥回文學的軌道。這場論爭在《中國青年報》（主要交鋒陣地）、《讀書》、《科普創作》等刊物上從1979到1983年延續了四年之久，其中在1980至1981年間，「姓文」的力量總體增強，一些科普作家如趙世洲、高士其等，都或多或少地接納了科幻小說不承擔科普功能的觀點，開始承認科幻小說的文學價值，儘管趙世洲在後來又有反覆^⑩。之所以會如此，筆者推斷原因有二：一是科幻小說家從1950年代開始已對科幻小說的說教式套路感到不滿，為科幻小說掙脫兒童化、科普化打下了基礎；二是以《珊瑚島上的死光》為代表的科幻小說中尖銳的社會矛盾衝

突、敵我分明的鬥爭敘事和英雄式的科學家形象，與新時期初主流文學的時代精神相吻合。後者不僅將科幻小說從科普陣營拉向文學陣營，還為科幻小說進入文學主流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二 重返「文學性」之一：跟從時代轉型的失與得

蕭建亨曾感嘆，「中國的科幻小說的發展一開始就伏下了一個潛在的危機。這危機就是『工具意識』過於強烈——僅僅把科幻小說當成了一種普及科學知識的手段，而忽略了科幻小說作為文學品種之一的文學品質。」^②如果說「科普」是中國科幻小說因「工具意識」走過的第一段彎路，那麼「時代鼓手」的姿態，或可說是科幻小說因「工具意識」走過的第二段彎路。

長期以來，科幻小說從屬於「科學文藝」之下，被劃歸到科普或兒童文學領域，加上本身「文學性」缺乏等因素，被排斥在主流文學話語圈外。在當代文學史著述中，幾乎看不到科幻小說的痕迹。這種漠視和低估，讓不少科幻小說家感到不滿^③。文革結束後，為了改變多年來不接地氣的局面，一些作家開始將體現時代風雲變幻的政治鬥爭引入科幻故事，這種介入現實的努力讓部分科幻小說成功躋身主流文學話語圈，但就像彼時的主流文學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帶上了鮮明的政治功利色彩一樣，不少科幻小說亦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時代傳聲筒的角色，失去了科幻的獨特個性。

以金濤的《月光島》(1980)為例，這篇小說的科幻情節有兩處：一處是梅生用螞蟻提煉的生命復原素救活孟教授的女兒孟薇，另一處是月光島上的居民都是來地球考察的天狼星人。如果去掉其中的醫學和天文學元素，小說依然會很完整，並且會是一篇典型的「傷痕文學」作品^④。類似的小說還有一大批，如邱耀全、莫樹清《神秘的報案人》(1980)，魏雅華《天窗》(1980)，尤異《大青山上的魔影》(1981)等，其中，科學幻想已經不再是小說的主體，而是變成了可有可無的調料，從而失去了科幻小說的特質。當時這些作品曾遭受一些質疑^⑤，但由於作品與時代思潮的強烈共鳴，有關批評都相對溫和，像《月光島》這樣情節起伏、情感豐厚的作品還是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同^⑥。

意識形態對科幻小說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反映社會政治現實的訴求上，還表現在對科學觀認識的規約上。相比前者，後者的要求更為強烈。因為在文學領域，前者可以由精英文學來完成，而後者只有科幻小說才能承擔。我們或者可以從葉永烈的小說《自食其果》(1981)遭受的批判入手展開探討。

嚴格說來，《自食其果》並不是一篇以反思「科學進步論」為中心的科幻小說。它是葉永烈對美國科幻小說《酷肖其人》(*In His Image: The Cloning of A Man*)的續寫，講述的是極端利己主義者莫克斯用單性生殖的辦法生下小莫克斯，他與父親一樣是「赤裸裸的個人主義者」，最後為金錢用陰謀殺死了父親^⑦。如葉永烈所說，他在這篇作品裏表現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利己主義』的冰水」^⑧。但這篇小說引起爭議的焦點，卻是對自私遺傳的幻想。有論者質問，「如果未來科學的發展真如《自食其果》中那樣可怕，人類的美好未來又在

何方？一切有真知的人們能接受這種『科學未來的預告』嗎？」^⑳在這些論者的眼裏，科學的幻想要「符合人類，社會與事物發展的歷史規律，因此總是積極、上進，能推動社會發展與科學進步，是科學思想的體現」^㉑，於是，他們指出這種「科學的發展僅僅是為爾虞我詐提供條件」的寫法，「不僅是對科學的污染，而且也是對文學的污染」^㉒；甚至有人譴責小說「脫離了馬克思主義也脫離了科學，不僅污染了讀者的心靈，也敗壞了科幻小說的名聲」^㉓。由此可見，對《自食其果》的批判上升到政治思想的高度。

為甚麼一個關於自私遺傳的幻想會遭到如此猛烈的批判？原因在於「科學進步論」之於新時期初中國社會政治的重要性。作為一個後發國家，「科學進步論」對二十世紀的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時期，在「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明確定位下，以科學理性為核心的現代價值體系再次啟動重建——相信科學是一項不斷進步的事業，必然導致社會的持續進步，以「科學進步論」為主導的價值觀讓新時期初的科幻小說充滿了積極樂觀、昂揚向上的明朗色調。如童恩正的《追蹤恐龍的人》（1980）、鄭文光的《泅渡東海》（1981）等，都描繪了人類在先進科技幫助下獲得更強大發展的美好未來^㉔。這一由意識形態推動的現代化發展理念，不僅作為體制化的「知識」被人們接受，而且在未能衝破文革敵我思維慣性的新時期初期，是否認同這種發展模式，還成為考量一個人政治立場的重要標準。這在科幻小說創作方面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對文明與進步問題的反思遭受極大壓抑，相關科幻小說不僅數量少，而且幾乎都沒有受到重視，像金濤的《暴風雪的奇遇》（1981）、《小安妮之死》（1984）等反思人類的貪婪毀壞自然的優秀作品，僅有個別評論略有提及^㉕；二是思考空間受到局限，如在白錫喜《生與死的搏鬥》（1979）、劉肇貴《β 這個謎》（1979）、王寶安《萬國博覽會上的竊案》（1980）等大批小說裏，以科學理性為核心的價值觀均凝結了深重的國族及民族焦慮^㉖。這種強烈且持續的焦慮意識猶如一道屏障，不僅讓科幻小說無法從「中華性」上升至「人類性」，進入對人類普遍情感及共同未來的深廣思考空間，而且阻礙了科幻小說創作眺望未來的目光，僅集中於當下現實的價值思考，讓科幻小說難以構建起具有超前意識的世界觀、歷史觀。

跟從時代轉型既有其失，亦有其得。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下人道主義思潮的復興，讓「人」、「人性」成為具有普遍整合力的新價值話語。與其他類型的文學創作一樣，科幻小說在承擔政治控訴功能的同時，也開始了籲求人性的書寫。蕭建亨的《沙洛姆教授的迷誤》（1980）講述了沙洛姆教授想用機器人改造流浪兒卻失敗的故事，告訴讀者「人的獨特的氣質，複雜的心理，是機器永遠模擬不了的」^㉗。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1981）通過「我」與機器人麗麗的婚姻經歷來說明沒有靈魂、只知道絕對服從的機器人不可能成為人類的伴侶^㉘。童恩正的《遙遠的愛》（1980）則敘說了一段地球人與外星人相戀的動人愛情。從來沒有對異性動過心的男主人公，愛上了TX-11星球上的高級生物瓊，而他真摯的愛情，也打動了這位根據科學需要分配生命的外星女孩。雖然他們最終沒能在一起，但男主人公對女孩永不相忘的等待讓人深深動容^㉙。魯迅曾指出科學小說應「經以科學，緯以人情」^㉚，但1930年代之後

科幻小說的創作卻一直趨向有經無緯，缺乏社會人情的表現。對人性的開掘，應該說是科幻小說從時代思潮中吸取到的最寶貴資源。雖然上述科幻小說對人性的書寫還比較簡單，缺乏將科學假設與人性倫理融為一體的佳作，但畢竟已經邁出了轉型的艱難一步，為以後的發展奠定了新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科幻小說家跟隨時代轉型的努力也得到了文學界的普遍認可。在1980年代初，不僅《人民文學》發表了蕭建亨的《沙洛姆教授的迷誤》和《喬二患病記》（1981）、葉永烈的《腐蝕》（1981）等小說，《上海文學》、《北京文學》、《當代》、《小說界》、《四川文學》等主流文學期刊也紛紛刊載科幻小說。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還獲得了「北京文學獎」，鄭文光的長篇科幻小說《飛向人馬座》（1979）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則改編了童恩正的《古峽迷霧》成為電視劇《青銅劍》。在「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中，為了保住科幻小說的「文學性」，作家和編輯多方奔走，積極邀請文藝界領導和科學家如周揚、林默涵、馬識途、錢學森等人撰文支持。正是這樣的努力，讓科幻小說「文學性」的火種得以存活，並在1983年「清污運動」打擊後全國僅存《科學文藝》一家科幻雜誌的局面下繼續燃燒。

轉型期不同的價值觀重建，以及「科學」與「文學」不同關係的重構，讓這一時期的科幻小說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態勢，主要表現為三種類型：第一，承繼兒童科普創作傳統的作品，成為新時期初科幻創作的重要類型，相比1950至1960年代，這類作品在故事情節的趣味性和豐富性方面有所加強，想像力也有所提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說教的枯燥，如劉興詩的《美洲來的哥倫布》（1980）、鄧魯的《沒有鼻子的「大象」》（1980）等，都是很受小讀者歡迎的科幻作品；第二，是將主流價值觀與科幻個性融合一體的創作，如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泗渡東海》，童恩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追蹤恐龍的人》，尤異的《大青山上的魔影》等；第三，是結合了偵探推理等敘事技巧，以驚險奇異幻想為特色的創作，如葉永烈的「金明」破案系列（1980-1982），王金海的《鹿角賓館奇案》（1980），王金海、戴山的《地下魔影》（1980）等。這些「驚險科幻小說」相較前兩種類型的價值內涵與彼時意識形態話語的高度同一，則有着逸出政治導向，朝向民間自在生長的意味。也正因為此，這類小說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並且到了後來，這場關於敘事手法的論爭，還因意識形態的介入發生了從文學技巧性到思想科學性的質的改變。

三 重返「文學性」之二：通俗化的嘗試、批判及反思

如英國科幻小說家奧爾迪斯（Brian W. Aldiss）所言，「科幻小說是一種充滿了意外驚奇的文學。」^⑨這種意外驚奇的製造，需要通過離奇的冒險、懸疑的情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場面等呈現出來。《蘇聯大百科全書》把「科學幻想讀物」稱為「接近於空想和驚險作品」^⑩的文學樣式，認為它具備刺激讀者心理，將讀者帶入緊張驚險情境的能力。1950至1960年代中國科幻小說的弊病，就在於毫無趣味的說教，缺乏這種驚險的閱讀效果，失去了文學價值。

因而，新時期初科幻小說藝術手法的改進，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增強其驚險性，用生動可感的形象和波瀾起伏的情節讓故事變得引人入勝，從而拾回曾經失落的文學性。

如何增強驚險性？新時期以前，中國科幻小說吸收、借鑒的國外同類小說驚險敘事手法不外乎兩種：一是地表之外的歷險記模式，如法國科幻小說家凡爾納 (Jules G. Verne) 的《地心遊記》(*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 等^④；二是人際之間的敵我鬥爭模式，如蘇聯科幻小說家阿達莫夫 (А. Адамов) 的《驅魔記》、羅薩霍夫斯基 (Роша Овский) 的《金剛石》^⑤等。這兩種模式在新時期之初被視為糾偏科幻小說科普化傾向的「法寶」，得到廣泛使用，如使用歷險記模式的劉興詩《美洲來的哥倫布》，王曉達《冰下的夢》(1980)，嵇鴻、繆士《遠探水晶山》(1981) 等；還有傳承敵我鬥爭模式的胡曉林《刻着「T·K」的戒指》(1980)，胡學增、王勝榮《「114」號元素的秘密》(1980)，以及前述的《月光島》、《腐蝕》等。

從1970年代末起，國外科幻出版物的譯介進入有史以來最繁盛的時期，據郭建中的統計，1979到1984年間中國翻譯的科幻小說數量遠遠超過了二十世紀前七十多年翻譯的總和。不僅經典的如凡爾納、英國科幻小說家威爾斯 (Herbert G. Wells) 及蘇聯的作品被重新引進，而且英美當代科幻創作大師，如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等人的作品也開始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⑥。其中，美國科幻作品及其創作理論為中國驚險科幻小說的敘事技巧提供了一種參考模式：偵探推理。

作為消費文化造就的產物，美國科幻小說萌芽於通俗雜誌，通過下層社會民眾能夠認同的敘事套路來回應時代，呈現對未來的思考。商業化色彩和通俗化定位，決定了美國科幻小說強調奇異和恐怖、喜歡新發明和新科學概念的創作風格。早在1979年，葉永烈就嘗試將阿西莫夫的偵探科幻，還有英國柯南道爾 (Arthur C. Doyle)、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等國外推理小說的創作技巧融為一體，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⑦。從最開始的《生死未卜》(1979)、《欲擒故縱》(1979)、《神秘衣》(1979)、《弦外之音》(1980)，到後來以金明為主角的驚險科學幻想系列，再到長篇小說《秘密縱隊》(1981)，葉創作出了許多以偵探疑案為中心事件的驚險科幻小說。縷縷不絕的懸疑之感，層層剝繭的嚴密推理，奇幻冒險的案件情節，將讀者帶進一個個神秘驚悚的科幻世界，因此大受好評。於是，新銳作家也紛紛效仿，向驚險科幻小說進軍，如王金海《怪島幽魂》(1982)、吳岩《引力的深淵》(1982)、駱漢城《我就是我》(1983) 等。

然而，他們的嘗試卻招致了文壇的嚴厲批評。批評的聲音有兩類：第一類基本上來自科普界，認為驚險科幻小說固然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卻削弱了科學性^⑧。但隨着科幻小說不再擔負科普功能的觀點逐漸被文壇接受後，這類批評在1980年之後逐漸減少，且多為「清污運動」時期泛起的沉渣之作；第二類是從文學性層面展開的「科學性」批評。這類批評聚焦於驚險科幻小說使用的偵探推理敘事手段，以及在作品中呈現的血腥凶殺、詭秘奇異等情節，認為其寫法的「價值可以說連過去的一些鴛鴦蝴蝶、才子佳人還不如」^⑨。還有的批評「相當一部分驚險小說思想貧乏，格調不高」，科學幻想成為增加

驚險氣氛的道具，「致命的弱點是一個『假』字，不真實，不合情理，荒誕就由此而生了」^{④7}。

這些批評與五四啟蒙知識份子對科學觀「異化」的科幻小說的批判顯然是一脈相承的。如前文所述，晚清文學商業化大潮催生了以娛樂性閱讀為目的的談神說鬼類科幻小說，導致「科學」被嚴重「異化」，背離了反迷信、崇科學的根本宗旨，激起了魯迅等新文化先鋒的強烈批判。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後，打着「重返啟蒙」旗號的新時期知識份子，同樣抱着對科學觀的捍衛心理，對驚險科幻小說大加筆伐。有論者在羅列了葉永烈《鬼山黑影》（1981），王金海、戴山《地下魔影》，喬清昶《方教授的鬼魂》（1980）等多部帶「鬼魂」、「殺人」、「屍」、「怪獸」標題的小說後，指責這些小說都是「按照某些科幻作家提出的『幻想』+『驚險』、『幻想』+『愛情』的程式製造出來的『商品』」，只會「刺激得讀者毛骨聳然、頭腦發昏」^{④8}。更有嚴厲的批評稱這些小說「一味仿製外國商業性科幻小說」，「已經不是拾人牙慧，而是在拾破爛了」^{④9}。

無論是晚清的神鬼摻雜還是1980年代的暴力、色情摻雜，其根本問題在於科幻小說的「幻想」成份。五四新文化先鋒用利筆誅伐了歪曲、異化了「科學」的幻想，其結果是科幻小說失去了其幻想成份，從此喪失了它在新文學中的獨立地位，成了單純的科普讀物；新時期的「姓科」還是「姓文」之爭，討論的依然是「幻想」是否能夠與「科學」並存的問題。所幸的是，這場爭議最後還是以肯定文學幻想的存在而告終，這就使得文學界能夠進而探討另一個問題：我們需要怎樣的幻想來支撐科學？為甚麼評論者能接受凡爾納、別里亞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Р. Беляев）、阿西莫夫的驚險敘事模式，卻無法認同國內興起的驚險科幻小說？筆者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新時期之初的驚險科幻小說的確存在自身格調不高，以及在精神理念和審美品格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如忻鈞《多頭蛇妖》（1980），計紅緒、計三猛《王府怪影》（1981），毅康《屍變》（1981），孫傳松、楊北星《美女蛇奇案》（1982）等作品，過份追求閱讀刺激和欲望宣洩，故意製造一些暴力、色情的故事情節，使科學幻想成了增強感官衝擊力的道具，導致敘事滑向粗鄙庸俗；更有甚者，一些作品走上了晚清鬼神類科幻小說的老路，脫離了科幻小說的創作本質，如《王府怪影》中用科學儀器喚出清朝寧王福晉那顏氏，並從她那裏獲得埋寶確切位置的構想^{⑤0}。而且，在商品化的運作下，程式化的情節設計，以及夾雜着推理、懸疑等敘事技巧的模式化表現手法造成的弊端也是明顯的，如人物形象的扁平、故事內容的重複，缺乏思想上的提升等等。

其二，這種拒斥亦是中國文學雅俗對峙歷史格局的體現。從古代的詩文正宗、小說戲曲被視為「鄙俗」的「小道」，到五四文學革命時期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兩大陣營對峙，雅俗之爭始終存在。以通俗文學面目出現的驚險科幻小說成為嚴肅文學的批判對象，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正如陳平原所言，高雅小說和通俗小說「雙方互有佔便宜的時候，但誰也別想把對方完全扳倒」，而小說藝術正是在這場「永遠難解難分的拔河比賽」中悄悄地「移步變形」^{⑤1}。並且有論者指出，雖然「小說的市場性很容易使作品流於庸俗化和模式化，……但是優秀的通俗小說往往利用市場性的特點向一些新型文學文類和藝術門類學習，不斷地更新自我的美學內涵」^{⑤2}。

從美國科幻小說的發展史來看，好的驚險科幻小說往往會立足於通俗，從兩個方面實現模式的突破：一是微觀層面的，對科技未來的想像性突破，如機器人的類人化，向銀河外星系的探索等；二是宏觀層面的，對科學基本理論的想像性突破，如反相對論、反「薛定諤的貓」(Erwin Schrödinger's Cat)的量子理論等。通過這兩個方面的突破，驚險科幻小說得以逐漸滲透進更高文化智力層次的讀者群，從通俗進入高雅；從簡單的以娛樂為目的的現實逃離，進入嚴肅的對人類生存命運的探索。以偵探推理見長的阿西莫夫，以及將宗教、軍事主義與太空幻想完美結合的海因萊因 (Robert A. Heinlein) 等科幻大師，正是借用大眾文化，又突破了大眾文化的幻想模式，將科學的想像力延展至無限未來，掙脫現實主義束縛展開無羈的宇宙思索的佼佼者。

四 「清污運動」下的創作打擊與「精英化」的後續發展

令人遺憾的是，時代並沒有為中國驚險科幻小說提供進行自我革新、創造雅俗共賞的高藝術水平作品的契機。羅崗指出，1980年代文學延續了1950年代以來「國家」與「文學」的關係，即「具有鮮明特色的現代全能主義國家體制（既表現為文化和知識體制，也表現為經濟和政治體制）及其改革」與「文學創作（包括圍繞創作而產生的出版、批評、宣傳等活動）及其改革」之間存在着多重聯繫，相互影響、彼此衝突^③。正是國家體制的干預，阻斷了驚險科幻小說自我革新的可能。1979至1982年前後，由於人們依然處於與政治激情保持高度合拍的慣性思維模式中，關於科幻小說的爭論往往會從學術爭鳴變成政治攻擊、思想批判，但即便如此，雙方論爭還是能被控制在有來有往，勢均力敵的形勢之下^④。

然而，1983年開始的「清污運動」，讓原本持衡的爭論狀態變成了「一邊倒」。1983年3月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周揚做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3月25日，胡喬木主持中宣部會議，批評周揚和起草周揚文章的「人道主義和異化」這一部分的王若水，由此展開了周揚、秦川、王若水與胡喬木、鄧力群等中宣部領導之間的爭論。胡喬木、鄧力群將爭論情況上報常委，「說思想文化界的情況一團糟」^⑤。於是，10月的二中全會上提出了「精神污染」問題。一場聲勢浩大的「清污運動」迅速波及各界。在這場政治運動中，一直飽受爭議的科幻小說創作被認定為科普創作領域「精神污染」的重災區。

當年10至11月，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接連舉行兩次由理事長、秘書長主持的會議，邀請有關人員座談科普創作中的「精神污染」問題，矛頭直指科幻小說創作。高士其、茅以升、仇春霖、章道義、符其珣、李元等科普界領導及老作家紛紛認定科幻小說創作大有問題。高士其指出，「在一些作品中尤其是科幻小說中也存在着一些精神污染……我們必須經常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便能夠及時地對作品中的不良傾向和錯誤思潮進行必要的鬥爭」；茅以升認為，「以科幻小說為體裁的作品，問題就更為嚴重。他們不是按照客觀的

科學規律去辦事，而是任意地去曲解和歪曲科普創作的定義，……宣揚所謂的『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論』，這就嚴重破壞了科普作品的真實性和嚴肅性，使科普這一概念變成他人手中的一種任意表達他們自己的私念和達到某種企圖的工具」^⑥。11月5日的《人民日報》有評論文章直接指出，「一些掛上『科學幻想』的招牌的東西已經在社會上流行起來，並已造成科學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極少數科幻小說，已經超出談論『科學』的範疇，在政治上表現出不好的傾向。」^⑦從學術問題升級到政治問題，一時間科幻小說創作數量驟然減少，而其中最受打擊的當屬以驚險科幻小說為主體的通俗科幻小說。

此外，1983年後科幻小說整體衰落還有另外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一批科幻創作主導力量的退場。1983年4月，鄭文光因患腦血栓停止了科幻創作。不願再在科幻圈子內與論方鬥嘴的童恩正，則開始把眼光投向科幻以外，尋找能夠讓想像力自由發展的新空間。向來作為爭議對象的魏雅華、葉永烈、王金海等人，或轉向他類文學創作（為驚險科幻小說做出開創性貢獻的葉永烈轉向了傳記文學，魏雅華轉向了現實主義文學，尤異轉向了1950年代的兒童科幻寫作模式，繆士轉向了散文和一般題材的成人小說），或就此擱筆（王金海、忻鈞等退出了科幻創作）。這些有相當大影響力的作家的退場，讓科幻小說一下子失去了支撐力。

二是與此同時開始的出版業改制，讓一些期刊和出版社在舉步維艱的狀況下放棄了科幻作品的出版。1984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提出「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的行署、市、縣辦的文藝期刊，一律不准用行政事業費給予補貼，一些繼續試行補貼的期刊也要實行經濟核算，積極改善經營管理，精打細算，杜絕浪費，逐步減少虧損，爭取盡早實現自負盈虧，期刊也從國家補貼為主向市場轉變」^⑧。一些雜誌副刊或系列叢書，如《科學週報》副刊（即《中國科幻小說報》）、《科幻海洋》、《科學神話》等，都因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打擊而停辦。1985年，全國僅剩《智慧樹》和《科學文藝》兩家發表科幻作品的期刊，1986年《智慧樹》停刊後，《科學文藝》成為全國唯一的一家科幻雜誌。

1980年代後期，堅持下來的中國科幻小說家選擇了一條與精英文學同步的發展道路。1983年前後，為響應中央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文藝界紛紛召開座談會，撰寫文章，展開文藝創作民族化的討論，宣布「社會主義文藝也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具有中國的特色」^⑨。中國科幻小說的西化問題本來就十分嚴重，如日本評論家武田雅哉曾批評中國科幻小說「人物、地名都是中國的，但是，故事的內容和味道並不像中國。甚至連人物、地點也是外國的『作品』，並不能算『中國人的科幻小說』」，只是模仿外國科幻小說的「自我消遣」^⑩。因此，文藝界提出「民族化」口號後，科幻界也迅速跟進，把在美學風格上實現「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作為創作的新的目標。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之死》（1983），就是改編自《列子·湯問》中偃師的故事。1985年，文學「尋根」熱興起後，科幻小說又開始從民族心理結構方面展開民族化的新探索，並催生了繆士的《不要問我從哪裏來》（1986）、

魏雅華的《深山狼嗥聲》(1986)等一批「尋根」科幻小說。及至1990年代「國學熱」及「文化懷舊熱」盛行，探尋中國風格再次成為一些科幻小說的新目標。

1990年代以來，除了楊鵬等少數作家有意識地堅持走大眾化路線(但也多限於少兒科幻的範圍內)外，精英化成為科幻小說(尤其是成人科幻小說)的發展方向。儘管這種自我精英化沒能像1980年代初期那樣再次獲得精英文學的認同，但從精英文學中吸取的精神資源，卻成為了科幻小說後續發展的強大動力。作家關於「人」、「人性」的思考進一步深入，出現了何宏偉《光戀》(1992)、姜雲生《萬年孤寂》(1992)、韓松《宇宙墓碑》(1992)、王晉康《亞當回歸》(1993)和《生命之歌》(1995)等許多優秀作品。而晶靜《女媧戀》(1991)、《織女戀》(1992)、《夸父追日》(1993)，海子《精衛填海》(1993)，韓治國《憶秦娥》(1993)等作品，則用外星人造訪地球解釋女媧造人、后羿射日、蚩尤與炎帝之戰等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緣起，創作出極具民族特色的科幻小說。

然而，精英文學在對科幻小說產生提升其藝術審美與人文精神等正面影響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想像力束縛等負面影響。超越日常、超越現實的未來前景構築是科幻小說的致力所在，這也是科幻小說與其他小說(尤其是非幻想小說)的本質區別。如果說1980年代初期科幻小說的想像力是因政治意識形態而喪失，那麼到了1990年代，精英文學強大的現實主義傳統則成了導致科幻小說想像力喪失的新力量。從1990年代韓建國的《二十分鐘等於……》(1993)，孔斌的《星夜廣告》(1994)、《夢視》(1994)等對市場經濟下社會物欲化、商品化的諷刺批判^⑥，到新世紀遲卉的《古曼人棉城遺址調查手記》(2009)、駱靈左的《高樓》(2010)、陳茜的《紙上海》(2010)等對中國城市化社會現實的影射^②，反映社會現實而不是將未來照進現實成為了這些科幻小說的創作旨歸，與社會現實無疑走得過近，使這些科幻小說再度喪失了飛揚的想像力。

同理，具備人性思考和民族化想像的作品也許可以成為一部優秀的現實文學創作，但當上述兩者無法與未來結合時則不可能成為一部傑出的科幻之作。劉慈欣的《三體》(2006-2010)之所以被公認為當代中國最優秀的科幻小說，得到「把中國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的評價^③，就在於作者以現實人性為基礎又超越現實，將倫理思考擴展至囊括外星文明在內的宇宙，從而建構出一種基於理性與科技的新道德體系。而這種想像，如劉自己所言，是為了「尋找人類生存的終極目的」；「科幻要在天上飛」^④。劉的這句話，或許寓示了今後中國科幻小說家需要更加努力的方向。

註釋

① 童恩正：〈珊瑚島上的死光〉，《人民文學》，1978年第8期，頁42-59。

②③⑥⑩⑪ 蕭建亨：〈試談我國科學幻想小說的發展——兼論我國科學幻想小說的一些爭論〉，《科學文藝》，1980年第4期，頁61；63；63；65；63。

④ 童恩正：〈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人民文學》，1979年第6期，頁110。

- ⑤ 魯兵：〈靈魂出竅的文學〉，《中國青年報》，1979年8月14日，B4版。
- ⑦ 胡捷（Хузе Ольга）：〈論蘇聯科學幻想讀物〉，載黃伊編：《作家論科學文藝》，第二輯（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頁81、84、102。
- ⑧ 梁啓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載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24-25。
- ⑨ 蕭魯士原著，盧藉東譯意，紅溪生潤文：〈海底旅行〉，《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頁77。
- ⑩ 如有文章指出，要翻譯或創作出梁啓超心目中的理想「科學小說」，「不僅要求譯者/作者本人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要能夠將『科學』上升到精神的層面，明白其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物質技術」（任冬梅：〈從倡導「科學小說」看梁啓超早期科學思想〉，《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頁27）。因此，梁啓超期望的「科學小說」在晚清實如鳳毛麟角。
- ⑪ 參見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292。
- ⑫ 魯迅：〈隨感錄·三十三〉，載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314。
- ⑬ 吳岩認為，「在梁啟超的一極，科幻應該沿着科學上行，到達全新的哲理境界，進而破壞中國舊文化的思想根基，為中國人建立一種新的高瞻遠矚和富有想像力的另類視野。……而在魯迅的一極，科學應該沿着社會等級下行，盡量被納入日常生活並滲透到尋常百姓。」參見吳岩：〈直面邊緣〉，載《科幻文學論綱》（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頁5。
- ⑭⑯ 魯迅：〈月界旅行·辯言〉，載《魯迅全集》，第十卷，頁164。
- ⑰ 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135。
- ⑱ 葉至善：〈關於《失蹤的哥哥》的自白〉，《科普創作》，1983年第3期，頁39。
- ⑲ 鄭文光：〈談談科學幻想小說〉，《讀書月報》，1956年第3期，頁21。1950年代中期，一批蘇聯科幻小說被譯介進中國，受到中國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者的熱烈歡迎。如別里亞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Р. Беляев）的《「康愛齊」星》（1955）、《水陸兩棲人》（1958）、《陶威爾教授的頭顱》（1959），奧霍特尼科夫（Дай Охотников）的《探索新世界》（1955），齊奧爾科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Э. Циолковский）的《在地球之外》（1958）等，當中的太空歷險敘事或反特敘事，既鮮明地體現了時代精神，完成了科學普及和思想熔煉雙重任務，又以扣人心弦的懸念設置、驚心動魄的敵我鬥爭，帶給讀者新鮮刺激的閱讀吸引。
- ⑳ 趙世洲：〈不能只走一條道〉，《中國青年報》，1980年7月10日，B4版；高士其：〈祝賀《科幻海洋》的誕生〉，《科幻海洋》，1981年第1輯，頁3。
- ㉑ 葉永烈：〈蕭建亨和《布克的奇遇》〉，《世界科幻博覽》，2005年第9期，頁6。
- ㉒ 鄭文光：〈答香港《開卷》月刊記者呂辰先生問〉，載黃伊編：《論科學幻想小說》（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1），頁141。
- ㉓ 金濤：《月光島》（北京：地質出版社，1981）。
- ㉔ 如饒忠華、林耀琛指出，那些以寫人為主要的作品如果「根本不考慮通過小說向讀者普及科學知識」，那麼與一般小說就沒有區別，而這「是當前科學幻想小說創作中的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饒忠華、林耀琛：〈把科學幻想小說的創作提高一個新的水平——評1976年至1979年的科學幻想小說〉，《科學文藝》，1984年第4期，頁72）。魯兵則認為那些「以科學活動為題材的小說，旨在闡明在階級社會中，自然科學家必須為先進的階級的階級利益服務這一道理的小說」，只能被稱為幻想小說，不能被稱為科學幻想小說（魯兵：〈靈魂出竅的文學〉，B4版）。
- ㉕ 如劉秋生認為金濤「有力地鞭撻了『四人幫』橫行時那種千方百計羅織罪名致人死地，以至『株連九族』的封建法西斯行徑；深挖了以反動血統論為根基的那種不正常『政治審查』的廣泛而嚴重的流毒」，具有「廣闊的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主

題意義」。參見劉秋生：〈略談金濤科幻小說的創作特色〉，《科幻海洋》，1981年第3輯，頁156。

②⑥ 葉永烈：〈自食其果〉，載葉永烈等：《自食其果：生命的幻想》（成都：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頁30-56。

②⑦ 葉永烈：《追尋歷史真相——我的寫作生涯》，下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551。

②⑧ 梁耀：〈偽科學≠科學幻想〉，《中國青年報》，1982年6月12日，B4版。

②⑨ 曉吟：〈污水和孩子〉，《中國青年報》，1982年7月3日，B4版。

③⑩ 魯兵：〈不是科學，也不是文學〉，《中國青年報》，1982年4月24日，B4版。

③⑪ 周稼俊：〈值得注意的傾向——評葉永烈近作《自食其果》〉，《中國青年報》，1982年5月8日，B4版。

③⑫ 參見童恩正：〈追蹤恐龍的人〉，載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科學幻想小說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頁198-247；鄭文光：〈泅渡東海〉，《科幻海洋》，1981年第1輯，頁17-37。

③⑬ 金濤：〈暴風雪的奇遇〉，《科幻海洋》，1981年第2輯，頁111-19；〈小安妮之死〉，載金濤主編：《馬里蘭警長探案》（鄭州：海燕出版社，1999），頁175-209。另參見趙世洲：〈幻想中的現實〉，載趙世洲編：《科幻小說十家》（鄭州：海燕出版社，1989），頁249。

③⑭ 白錫喜：〈生與死的搏鬥〉，《兒童時代》，1979年第19期，頁27-29；劉肇貴：〈β 這個謎〉，《科學文藝》，1979年第2期，頁4-16；王寶安：〈萬國博覽會上的竊案〉，載工人出版社編：《「飛毯」的風波：科學幻想小說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頁84-103。

③⑮ 蕭建亨：〈沙洛姆教授的迷誤〉，《人民文學》，1980年第12期，頁77。

③⑯ 魏雅華：〈溫柔之鄉的夢〉，《北京文學》，1981年1月號，頁14-24。

③⑰ 童恩正：〈遙遠的愛〉，《四川文學》，1980年第4期，頁21-27；1980年第5期，頁32-36。

③⑱ 奧爾迪斯(Brian W. Aldiss)、溫格羅夫(David Wingrove)著，舒偉、孫丹丁譯：《億萬年大狂歡：西方科幻小說史》（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頁241。

④⑩ 蘇聯大百科全書：〈科學幻想讀物〉，載《作家論科學文藝》，第二輯，頁75。

④⑪ 凡爾納(Jules G. Verne)著，楊憲益、閻時清譯：《地心遊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魯迅譯：〈月界旅行〉，載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7-119。

④⑫ 阿達莫夫(А. Адамов)著，陳復庵、魯林譯：《驅魔記》（上海：潮鋒出版社，1955）；羅薩霍夫斯基(Роша Овский)著，奈溫等譯：《金剛石》（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55）。

④⑬ 郭建中：《科普與科幻翻譯：理論、技巧與實踐》（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頁12。

④⑭ 在1983年的〈驚險科幻小說答疑〉一文中，葉永烈談到驚險科幻小說非自己所創，先驅是美國的阿西莫夫（葉永烈：〈驚險科幻小說答疑〉，《讀書》，1983年第1期，頁63）。而在《追尋歷史真相》一書中，他談到自己在創作中融合了柯南道爾和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等國外推理小說的創作手法（葉永烈：《追尋歷史真相》，下冊，頁576）。

④⑮ 如趙世洲建議科普讀物增加趣味性不一定要借助文藝，「應該注意挖掘科學內涵的趣味」，「去激發讀者愛科學的興趣」（趙世洲：〈趣味在哪裏？〉，《中國青年報》，1979年6月14日，B4版）。魯兵則批評有的科幻小說作者「似乎把心血都撲到故事情節的構思，人物形象的刻畫上了，不說忘了，至少也是忽略了科學文藝的根本任務——傳布科學知識」（魯兵：〈形式與內容的結合〉，《中國青年報》，1979年7月5日，B4版）。

④⑯ 肖雷：〈「繁榮」的另一面〉，《文學報》，1981年4月16日，第3版。

- ⑴ 趙世洲：〈驚險科幻小說質疑〉，《讀書》，1982年第8期，頁60、65。
- ⑵ 谷守生：〈商品化的科幻〉，《中國青年報》，1982年12月11日，B4版。
- ⑶ 趙世洲：〈掛羊頭賣狗肉〉，《中國青年報》，1982年4月10日，B4版。
- ⑷ 計紅緒、計三猛：《王府怪影》（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頁1-168。
- ⑸ 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274。
- ⑹ 湯哲聲：〈論金庸小說研究中的幾個問題〉（2006年10月22日），新華網浙江頻道，www.zj.xinhuanet.com/2006special/2006-10/22/content_8314650.htm。
- ⑺ 羅崗：〈「前三年」與「後三年」——「重返八十年代」的另一種方式〉，《文景》，2012年第12期，頁57。
- ⑻ 如魯兵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不是科學，也不是文學〉一文（魯兵：〈不是科學，也不是文學〉，《中國青年報》，1982年4月24日，B4版），不點名地批評葉永烈的《自食其果》後，童恩正等十二位科幻小說作家便集體發表〈關於科幻小說評論的一封信〉，反駁魯文，支持葉永烈（童恩正等：〈關於科幻小說評論的一封信〉，《文譚》，1982年第8期，頁18-19），魯兵繼而又寫了〈報十二同志書〉予以回應（魯兵：〈報十二同志書〉，《文譚》，1983年第3期，頁21）。
- ⑼ 參見王若水：〈周揚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探索〉，《同舟共進》，1998年第6期，頁14。
- ⑽ 參見〈清除精神污染，繁榮科普創作：中國科普作協召開座談會〉，《科普創作》，1984年第1期，頁2-3。
- ⑾ 施同：〈科幻作品中的精神污染也應清理〉，《人民日報》，1983年11月5日，第3版。
- ⑿ 〈關於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國務院國發[1984]第187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5年第1期，頁10。
- ⓫ 參見王鳳勝：〈關於新時期文藝民族化的幾個問題〉，《東嶽論叢》，1983年第5期，頁104。當時，《文史哲》、《文藝理論研究》、《上海文學》等刊物編輯部及不少地區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都邀請了作家、理論家就文藝民族化問題召開座談會，並有紀要發表。如〈當前文藝創作和理論的現代化、民族化問題——《上海文學》《文藝理論研究》兩刊編輯部聯合舉行座談紀要〉，《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第1期，頁1-9；〈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問題（座談紀要）〉，《文史哲》，1983年第1期，頁53-61；方文：〈建立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學術討論會在寧舉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4期，頁5等。相關文章有何鎮邦：〈小說創作民族化的新探索〉，《前線》，1983年第2期，頁46-49；王鳳勝：〈關於新時期文藝民族化的幾個問題〉，頁104-108；孫蓀：〈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與文藝的民族化〉，《中州學刊》，1983年第6期，頁19-24等。這些文章都表達了文藝要走自己的道路，具有中國化特色的想法。
- ⓬ 武田雅哉：〈《電世界》——清朝末年的一篇科幻小說〉，《科學文藝》，1982年第4期，頁35。
- ⓭ 韓建國：〈二十分鐘等於……〉，《科幻世界》，1993年第1期，頁32-34；孔斌：〈星夜廣告〉，《科幻世界》，1994年第5期，頁1-4；〈夢視〉，《科幻世界》，1994年第5期，頁4-5。
- ⓮ 遲卉：〈古曼人棉城遺址調查手記〉，《科幻世界》，2009年第4期，頁62-68；駱靈左：〈高樓〉，載潘海天主編：《九州幻想·鐵三角》（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頁169-75；陳茜：《紙上海》，載吳岩主編：《2010年度中國最佳科幻小說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頁74-96。
- ⓯ 嚴鋒：〈從這裏到永恆〉，《南方都市報》，2010年10月17日，GB24版。
- ⓰ 新京報專訪：〈中國科幻第一人 劉慈欣：科幻要在天上飛〉，《新京報》，2008年12月10日，C15版。